

皖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变迁



朔 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皖西南指安徽省西南部长江北岸的大别山东南麓及长江南岸沿江一带,主要包括现在的安庆市所辖各市、县,长江南岸的东至县或可包括在内。区域内的地势总体上西北高,东南低,长江和其支流潜水、皖水等在这一带作用后形成了狭长的洪冲积平原,地势地平,河湖密布。

该区域的地理位置较为独特。从南北向看,这里处于自淮河中游南下进入长江中游和赣江下游的交通走廊的位置;从东西向看,是长江中游、下游之间交通的咽喉要道。若以长江为纽带来观察,则以皖西南和江西九江地区为中心可将整个长江中游、下游和淮河、赣江流域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东西方向上可沟通江汉平原与宁镇丘陵、太湖平原,南北方向上可沟通黄淮平原与赣北盆地乃至广大的华南地区的一个十字轴心^①,处于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以洞庭湖为中心的西部、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这样四

个大的文化区系的中间地带,因此,它在原始文化交流中便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皖西南是安徽开展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最早的区域之一。自1979年春发掘潜山薛家岗遗址后,又在整个皖西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并试掘和发掘了望江汪洋庙、麻圆墩、黄家堰、太湖何家凸、王家墩、枞阳小柏墩、宿松黄鳍嘴、怀宁黄龙、潜山天宁寨、岳西祠堂岗、安庆张四墩、夫子城等10余处遗址。经过大量的考古工作,这一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已相对清楚,在此基础上,探讨皖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变迁便成为可能(图一)。

皖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变迁,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即文化的兴起、文化的繁盛、文化的突变,与之相对应的,分别有黄鳍嘴类型、薛家岗文化、张四墩类型三个考古学文化(类型),这种变化既与自然条件相关,更与周边文化的演化息息相关。

物出版社,2000年。

王宁远、周伟民、朱宏中:《浙江桐乡姚家山发现良渚文化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国文物报》2005年3月29日。

2004年度昆山墓地的大口缸分为打破墓穴的小坑埋设和墓穴内葬具外随葬两种,可作参考。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杨家角遗址发掘情况简介》,嘉兴市文化局编:《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崧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

瑶山 M7:155 圆形器线图可作为《崧山》报告的补充。

牟永抗:《前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90年。

①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浙江桐乡普安桥遗

址发掘报告》,《文物》1998年第4期。

② 蒋卫东、李林:《梅盐周家浜遗址抢救发掘获硕果》,《中国文物报》1999年11月17日。

③ 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④ “单面钻孔”实为对钻孔成形后,再约在中段部位以双向的线切割一剖为二,以致成“单面钻孔”状。

⑤ 我们将反山 M17:40、瑶山 M10:25 那类一面平整。另面两端有凸起的扁条状玉件暂称为“条形器”,以示区别。

⑥ 报告认为可能是单独成件,成组出土。

⑦ 浙江省余杭县文管会:《浙江余杭横山良渚文化墓葬清理简报》,南京博物院:《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⑧ 刘斌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浙江》页72,科学出版社,2005年。

一.文化的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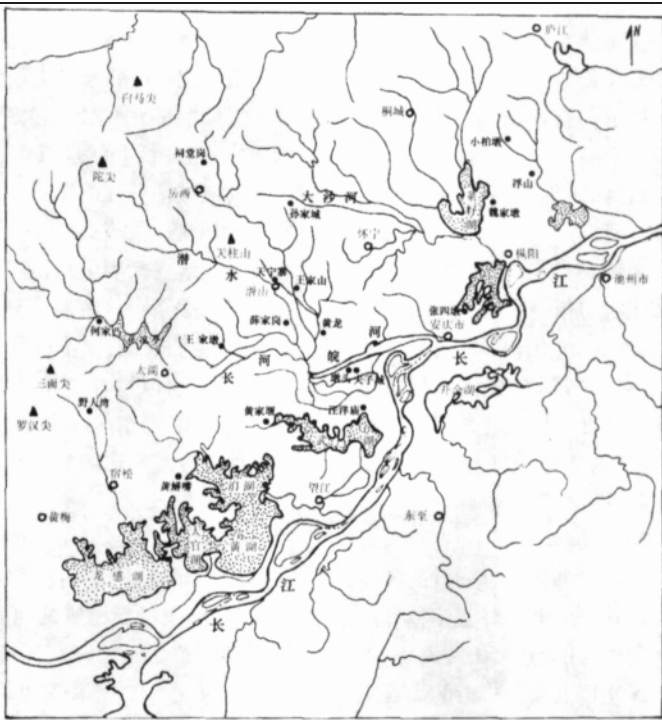
——黄鳝嘴类型

皖西南地区目前还没有发现 7000 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距今 6000 年以前,开始出现了一批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灰)胎黑衣陶为主,以鼎、豆、杯为主要器类,鼎的腹部较深,鼎足以足根饰按窝、足面略凹为特点的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宿松黄蚌嘴遗址^②,在太湖王家墩^③、枞阳小柏墩^④、安庆墩头^⑤都有发现,并

且在湖北东部一带也有分布,可称为黄鳍嘴类型。从太湖王家墩遗址的地层关系我们可以知道,这类遗存是叠压在薛家岗文化最早期遗存之下,因此它的相对年代应早于薛家岗文化,也就是说,黄鳍嘴类型的出现标志着皖西南地区原始文化的兴起。

黄鳍嘴类型的墓葬大多数为东北——西南向，随葬器物大多数为陶器，有少数石器和玉器。

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灰)胎黑衣(皮)陶为多,夹砂黑陶和泥质红陶次之。陶器均手制,多圈足器、三足器,平底器较少,圈底器罕见。陶器上的纹饰不多,主要有凹弦纹、刻划纹、戳印纹、按窝、附加堆、镂孔和少量彩绘,其中多角星纹特征显著。器形以鼎、豆、杯、碗、壶、盆为主,另有罐、釜、孟、盅和器盖、纺轮、陶球、弹丸等,其中圆腹罐形鼎、高柄钵形豆、大喇叭圈足碟形豆、单耳杯、釜形杯,是黄鳍嘴类型颇具代表性的器物,近圆锥状略弯曲的足根饰浅窝鼎足、足面略内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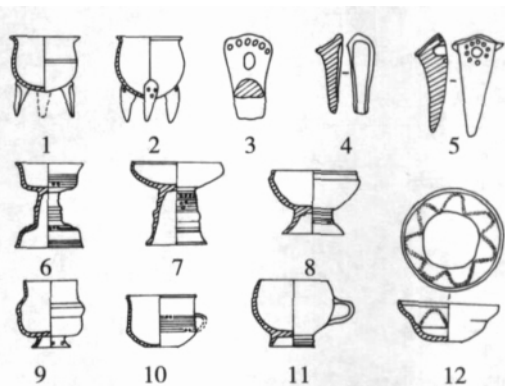


图一 皖西南新石器时代主要遗址分布简图

近根部饰按窝鼎足最具代表性。石器均为磨制，有斧、镑、镞、石弹丸等，装饰品以玉玦、璜为主，数量不多（图二）。

黄鳍嘴类型本身也有时代早晚之分,但总体上表现出了年代较早的一些特征,它与西边的大溪文化相比,具有一些相似的特点。如釜形鼎或罐形鼎大多略垂腹、上腹常饰多道凹弦纹,与鄂东北地区的大溪文化早期较为相似,近圆锥状略弯曲的足根饰浅窝鼎足也与鄂东北大溪文化甚至汉

水流域的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早期^⑥有关;黄鳍嘴类型颇具特色的粗高柄钵形豆、圈足较高的子母口深腹豆(似簋)与大溪文化关庙山四期接近;单耳杯在关庙山类型中出土较少,但四期的一件与黄鳍嘴遗址所出也颇接近。此外,黄鳍嘴类型的碟形豆(似盘)也是大溪文化广为流行的形式,陶器上盛行的各种刻划、戳印纹,也都与大溪文化有诸多相似。从这些方面看,黄鳍嘴类型的早期与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早期接近,晚期与关庙山类型的四期接近,黄鳍



图二 皖西南黄鳝嘴类型器物图

1.2 陶鼎 3-5 陶鼎足 6-8 陶豆 9 陶壺
10.11 陶杯 12 陶碗(均黃鰐嘴遺址出土)

嘴类型应相当于大溪文化早期偏晚到中期。黄鳍嘴类型与长江下游的文化也有一些交流，如折腹碗器内表面饰七角或八角星图案，与北阴阳营二期的同类器无论在器形还是纹饰上都十分相象^⑦，略垂腹鼎的形态与崧泽中层墓地的早期相近^⑧。

因此,黄鳊嘴类型相对年代应该相当于大溪文化的早期偏晚到中期、北阴阳营二期、崧泽中层墓

地早期,而早于薛家岗文化。它的绝对年代目前还没有直接的测年数据,参考大溪文化和崧泽文化的年代,可以估算其较早时期的年代大约在距今 6100—5700 年左右,最早不会超过距今 6500 年,最晚的年代可能已接近距今 5500 年左右。

黄鳊嘴类型的来源目前还不很清楚,但它的主要分布区域是大别山东南麓,并向西接近大溪文化分布区,而且作为最主要的器类——罐形鼎的早期形态与鄂东北的大溪文化密切相关。同时,也有若干文化因素与长江下游的同时期文化相关。可以说黄鳊嘴类型的产生并不是某一或两个文化的直接延续,而是在一个新的地域、在不同文化的交融过程中,经过变异形成的一个新的文化,但它的文化面貌与江汉平原的原始文化关系较为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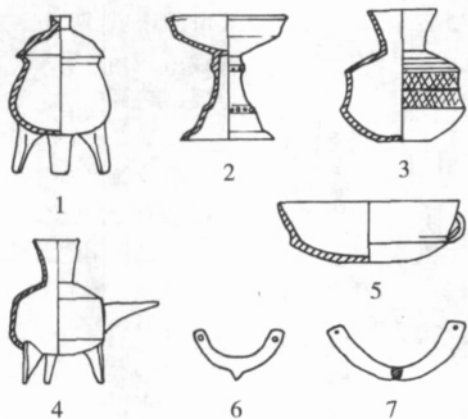
在黄鳊嘴类型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它不断地与周边文化相互影响和交流。如陶器上盛行的各种刻划、戳印纹,是距今 7000 多年到 5000 多年在长江中下游普遍盛行的一种装饰,在浙江萧山跨湖桥、南京北阴阳营、安徽繁昌繆墩以及长江中游的高庙文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中时有所见,它们出现的年代都较早,因此,黄鳊嘴类型陶器上与此相似的刻划、戳印纹当是受它们影响的产物。在黄鳊嘴类型的晚期,大溪文化的粗高柄钵形豆、圈足较高的子母口深腹豆(似簋)似也影响了黄鳊嘴类型。不过,黄鳊嘴类型的少量文化因素也对周边的文化有过影响,其中关庙山所出的单把杯应是明显的例证。

在黄鳊嘴类型之后,皖西南地区发展起来一支重要的文化——薛家岗文化。它主要分布于皖西南、鄂东、赣北鄱阳湖周围局部地区,主体部分以皖河流域为中心,在西起蕲水以东、东至枞阳以西、北止于大沙河流域的长江两岸的平原和大别山东南麓的两翼山前地带呈“V”字形分布,这样的分布形态说明它的分布既受大别山和长江的限制,也说明该文化与长江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整个文化的形成和经济特点都与长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⑨。按照现有的资料,该文化可以暂时划分为两个文化类型:皖西南的薛家岗类型、鄂东的鼓山类型。薛家岗类型主要分布在皖西南以皖河流域为中心的区域,鼓山类型主要分布在武穴、黄梅一带,而江西的材料不是很多,似乎与鼓山类型关系密切一些。

到目前为止,皖西南的薛家岗文化遗址至少已有几十处,经过发掘或试掘的有潜山薛家岗^⑩、天宁寨^⑪、怀宁黄龙^⑫、望江汪洋庙^⑬、麻圆墩^⑭、黄家堰^⑮、太湖何家凸^⑯、王家墩^⑰、枞阳小柏墩^⑱、岳西祠堂岗^⑲、安庆夫子城^⑳。这一时期遗址大都分布在湖泊周围或河流两岸的高地上,晚期则伸入到了大别山腹地。而且密度很大,其数量、分布范围都大大超过了黄鳊嘴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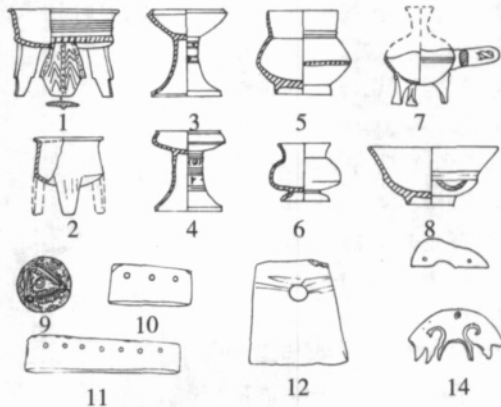
该文化的遗址规模不是太大,面积从数千平方米到数万平方米不等。遗址一般都有较集中的墓地,墓葬排列较为有序。墓葬形制除一部找不到墓坑外,其余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少数还有二层台,方向绝大多数为东北——西南向。在埋葬习俗上,大都流

二.文化的繁盛——薛家岗文化



图三 皖西南薛家岗文化早期器物图

1.陶鼎 2.陶豆 3.陶壺 4.陶碗 5.陶碗
6.7 玉璜(均天宁寨遗址出土)



图四 皖西南薛家岗文化晚期器物图

1.2 陶鼎 3.4 陶豆 5.6 陶壺 7.陶碗 8.陶碗 9.陶球
10.11 石刀 12.石铎 13.14 玉璜

行单人一次葬,也有部分二次葬,不少墓葬发现了用青膏泥涂抹墓坑四壁的现象。

皖西南的薛家岗文化至少可以分为早、晚两大期,墓葬中的随葬器物早期以陶器为主,晚期则玉、石器的数量大增,部分墓葬还随葬猪下颌骨。随葬品数量在晚期出现明显的分化,少数墓葬多达20件以上甚至40多件,且以玉、石器为主。

陶器以夹砂红陶、夹细砂或泥质灰陶、泥质黑皮(衣)陶占绝大多数,另有少量泥质夹植物壳或蚌末陶颇具特点。早期陶器的器物组合以鼎、豆、壶、鬲、碗(钵)为基本组合,鬲以长颈喇叭形口、侧装凿形实足、扁长三角形或麻花形把手为主要形态,鼎足以宽扁足、凿形足为主,豆的柄上部呈算珠形(图3)。

晚期器物组合中碗(钵)被盆所替代,纺轮、陶球也是常见的器类,鼎足以鸭嘴形、枫叶形最具特点,豆以足沿陡折成台状为典型特征。晚期的玉、石器数量大大增加,石器组合以刀、钺、镑为基本组合,其他器类较少,刀绝大多数为奇数多孔,以3至7孔多见,2孔石刀少见,刀的刃部较直或略内凹,晚期偏晚的少量3孔、2孔刀出现了弧凸刃;钺以器体扁薄的长方形和凤字形最具特点。玉器以钺、璜、镯、环、半球形饰、管为主,其中凤字形钺、半球形和器体瘦长的桥形璜、半球形饰特征明显(图4)。

皖西南薛家岗文化早期的部分器物与黄鳊嘴类型有十分紧密的演化关系,晚期则出现了一定量的良渚文化中期或晚期偏早的器形,因此,其相对年代应紧接黄鳊嘴类型之后,结束于良渚文化中期或稍后,绝对年代大约在距今5500-4600年左右^②。

皖西南薛家岗文化最早期有王家墩二期文化、薛家岗一期文化、天宁寨早期文化的第4层,它们与黄鳊嘴类型相比,共同特征很多,但也有若干差异。相同之处如陶器以夹砂红陶和黑皮(衣)陶为主;纹饰中有凹弦纹和刻划、戳印纹;器物组合中的鼎、豆组合也相同。就器物的具体形态而言,如薛家岗M109 1的内弯弧形近锥状鼎足圆腹鼎和M5 4簋都表现出与黄鳊嘴M5 5、M7 1有很大的相似性;王家墩M2 2和薛家岗M5 6碗均上腹凹弧,中腹内收,平底,与黄鳊嘴的M4 1和M14 1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这些器物都是薛家岗文化的典型器,因此,黄鳊嘴类型应是薛家岗文化的源头之一。但是,薛家岗文化最早期多平底器和三足器,圈足器很少,壶的数量较多且不同于黄鳊嘴类型,豆的形态与黄鳊嘴类型大不相同,鬲则为新出的器类,表明它和黄鳊嘴类型有了较大的变异。

在黄鳊嘴类型中我们找不到薛家岗文化最早期陶器中豆、壶的源头,但却能够崧泽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中找到。在风格上,薛家岗文化最早期的豆盘折棱作风和柄上部算珠状鼓凸与崧泽文化和北阴阳营的部分豆柄风格相同,而此类豆的形态则成为薛家岗文化后来最主要的特点之一;薛家岗文化最早期壶的双折腹风格则多见于崧泽文化之中,长颈壶也与崧泽文化相似。这些因素应与崧泽和北阴阳营文化——特别是与崧泽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薛家岗文化的陶鬲是最具特点的器物之一,应属自身的典型器物,但与宁镇地区的陶鬲具有明显的血缘关系。而整个长江中下游陶鬲的祖型应来源于山东、苏北一带,它在其后曾广泛影响到长江下游地区,薛家岗的陶鬲极有可能是大汶口文化陶鬲经宁镇地区辗转传承的,虽不能说是直接源于大汶口文化,却应是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因此薛家岗文化的产生与北方的大汶口文化也有少量间接、松散的联系。至于西边的大溪文化,对皖西南薛家岗文化早期的影响表现得并不很直接。

皖西南薛家岗文化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的产生应与当时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规模文化交流背景直接相关,从本质上说,应是在继承本地早期黄鳊嘴类型部分因素的基础上,融合了较多的崧泽文化因素,并接受了部分北阴阳营和大溪文化甚至大汶口文化的因素而形成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在皖西南薛家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即西边的影响微弱,东边的影响明显,晚期时北方的影响则相对增加,同时薛家岗文化的若干因素也开始向外传播。薛家岗文化晚期时,良渚文化因素开始进入到皖西南一带,如双鼻壶曾见于皖西南的薛家岗、夫子城等数个遗址之中;高柄盘形豆(如薛家岗M34 1)的形态和横向长镂孔特点与反山M22 61基本相同,这类器物在薛家岗文化中少见,当属良渚文化风格;石器中的柳叶形钺、玉器中如玉锥形饰、小玉琮无疑是良渚文化风格。到了薛家岗文化晚期偏晚阶段,淮河中游以篮纹鼎为代表的大汶口晚期文化因素开始较多地影响到薛家岗文化,如薛家岗遗址M131 2的鼎足已经呈现出淮河中游大汶口文化晚期侧装三角形足的影响;T8 86鼎身饰篮纹、鼎足呈侧装扁平三角形的风格也明显是受其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在接受东、北方文化影响的同时,薛家岗文化因素也开始了向其他文化的传播。其中最明显的是

向西传播,如在螺蛳山遗址中^②,可以见到部分薛家岗文化的因素,螺蛳山第二次发掘 M3 5 鸭嘴形鼎在螺蛳山遗址中出土极少,而与薛家岗文化的同类鼎较为接近,应是受薛家岗文化影响所致;扁折腹壶(M9 1、M2 3)当是受薛家岗文化影响,这种壶在屈家岭文化的其他遗址中也多有出土,说明薛家岗文化对屈家岭文化有相当的影响;此外,在螺蛳山遗址第二次发掘的 M2 13 和 90 年发掘的 M3 6 多孔石刀无疑是薛家岗文化的影响。同一时期的薛家岗文化对赣北地区也有所影响,但大体上不超过现今的鄱阳湖南岸一线,而且是以鄂东鼓山类型对其的影响为主。太湖流域新出现的两孔、三孔石刀^③,似也应归于薛家岗文化的影响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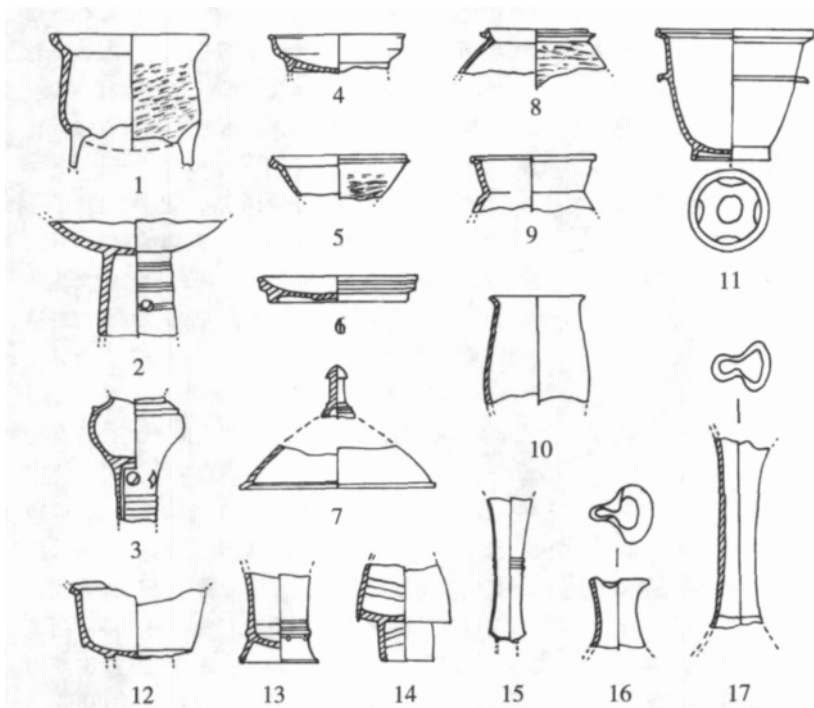
皖西南的薛家岗文化在晚期阶段达到了繁盛,但很快又急剧地衰落,其后皖西南兴起了一种以张四墩类型为代表的新文化,与薛家岗文化相比,无论是陶器还是玉、石器的制作技术、种类、数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异,大部分文化因素都与薛家岗类型缺乏传承关系。

三.文化的突变——张四墩类型

以安庆张四墩遗址为代表的张四墩类型在时间上基本与皖西南的薛家岗文化晚期相接,但两者的文化面貌迥然不同,是继薛家岗文化之后该区域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

张四墩类型的分布范围比薛家岗类型稍有扩大,北界可越过大沙河流域到桐城北部,东界可扩至枞阳东部的陈瑶湖附近,南部情况不清楚,向西在鄂东这一时期的遗存是以陆墩遗存为代表,文化面貌与张四墩类型部分相同,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或许为同一文化的两个类型之别。在皖西南,张四墩类型的遗址数量明显较薛家岗类型为多,分布密度较大,各县调查的遗址材料中,凡有新石器文化遗存的遗址大多数都有张四墩类型文化因素,目前已知的遗址不下百处,如见诸报道的太湖野人湾、宿松何家凸、枞阳浮山和小柏墩、毛竹园、魏家墩、夜城墩、狮子山、子午墩等遗址中都包含有张四墩类型的器物^④,但经过试掘或正式发掘的很少,只安庆张四墩^⑤、潜山薛家岗^⑥、岳西祠堂岗^⑦几处。

张四墩类型的陶器有夹砂灰、黑陶和泥质灰胎



图五 皖西南张四墩类型器物图

1.陶鼎 2-4 陶豆 5.陶盆 6.陶盘 7.陶器盖 8-10 陶罐 11.陶甗
12-15 陶杯 16.17 陶甗颈(均张四墩遗址出土)

黑衣陶、红褐陶,以及泥质夹植物壳红褐陶等,也有少量泥质纯黑陶。陶器烧成温度较高,有手制和轮制两种工艺。器表基本为素面,纹饰多见篮纹,另有少量的凸棱、凹弦、附加堆纹、刻划纹、弦纹、戳印、镂孔等。器类有鼎、甗、罐、盆、盘、豆、鬲、壶、杯、碗、缸、盂等。以鼎、甗、罐、鬲、豆、杯为主,罐类增多,壶较少。鼎常饰横篮纹或斜篮纹,沿面内凹,鼎足以横装扁平带凹槽足为主,也有较多的侧装扁平三角形带刻划纹足。鬲均为夹砂红陶,颈呈长管状,捏流或卷叶流,而一种短颈两侧带扉棱、类似两翼的鬲则是本地十分有特色的风格(图五)。

石器一般磨制较精,刃口锋利,数量和种类都较少,器类有斧、钺、镑、镞、凿等。石铤

的数量有所增多,除仍有柳叶形镞外,新出现了镞身呈三棱锥状的镞。玉器制作似乎已趋于消失。

张四墩类型的器物与薛家岗文化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只有已处于次要地位的黑皮(衣)陶和少量的泥质夹植物壳陶应受传于薛家岗类型,具体形态上仅有篮纹鼎、少量鸭嘴形鼎足和接近消失的陶球与薛家岗文化有关。张四墩类型的很多因素多见于其他文化中,如横篮纹装饰的盛行、足正面饰多道凹槽横装扁平足、侧装扁平三角形足是淮北和江淮北部地区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早期阶段颇为流行的一种形式,夹砂红陶颈呈管状的长颈捏流或卷叶流鬲也常见于长江中游的史家河文化和下游的良渚文化晚期,并见于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晚期文化,短颈鬲、鱼鳍形和丁字形鼎足应是受良渚文化的影响,甗、塔形钮器盖这类数量较多的器物又明显与史家河文化的器物形态相当接近,特别是陶器以鼎、甗、罐、鬲、豆、杯为主则更表现出与西边的史家河文化有相似性。在具体的材料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四墩类型的不少器物可以在史家河文化的遗址中找到相应的器形,如薛家岗 T36 11 篮纹罐与麻城栗山岗早期 M2 15 很相似^②;张四墩 H4 4 豆把下部与随州西花园 T21 B 50 接近^③;张四墩 H4 3 泥质纯黑陶觚形杯与麻城栗山岗晚期 T9 B 5 完全一样^④,它们属于史家河文化较早的时期。此外,张四墩的塔式盖也是史家河文化从早到晚常见的一种形态。若与良渚文化相比,张四墩发现的少量 T 形鼎足是良渚文化中晚期新兴的一种鼎足形式,而一件残陶甗(G1 1)上刻划的短颈捏流或卷叶流、上腹饰附加堆纹的陶鬲形态与嘉兴雀幕桥所出的良渚文化晚期同类器基本相同^⑤。

因此,张四墩类型大体相当于淮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最晚期、良渚文化晚期和史家河文化稍早时期,晚于本地的薛家岗文化。按照上述几支文化的绝对年代框架,张四墩类型开始的绝对年代大约在距今 4600 年左右,结束时间还难以确定。

张四墩类型与薛家岗文化没有密切的传承关系,与史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则属于文化交流的关系,它们之间只具有部分文化面貌的相似性,而本质上并不属于同一文化。如此,张四墩类型的文化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与张四墩类型在时代、地域和面貌上都较为接近的其他文化有巢湖西北部以古埂晚期文化为代表的龙山时代文化、鄂东以陆墩遗存为代表的文化。它们与张四墩类型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篮纹鼎、侧

装扁平三角形鼎足、横装扁平带刻槽鼎足等。张四墩类型与陆墩遗存相比,两者在甗和部分豆的形制上也较为接近,但是,陆墩遗存对当地的薛家岗文化有一定程度的继承,而甗、卷足鼎足的形态表明它受史家河文化的影响比张四墩类型更大,因此,两者究竟是属于同一个文化两个不同类型还是不同的文化,目前还缺乏足够的材料加以分析,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具有属于同一文化两种类型的可能性。张四墩类型与古埂晚期文化相比也有相似之处,如共有长颈鬲、矮圈足小盘,但古埂晚期的细绳纹、鼎足足尖外侧捏出凹窝的风格又不见于张四墩类型。从大的方面看,在张四墩类型中史家河文化的因素要多些,而在古埂晚期文化中淮河中游的文化因素多些,因此,两者之间至少是不属于同一文化类型的。

无论是张四墩类型还是古埂晚期文化,它们都没有或者说很少继承当地的早期文化传统,而却都与北方的淮河中游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以薛家岗遗址五期为代表的薛家岗文化晚期偏晚时,淮河中游以篮纹鼎为代表的大汶口晚期文化因素开始较多地影响到薛家岗文化,从薛家岗类型最晚期开始,随着侧装扁平三角形鼎足和篮纹鼎的南下,淮河中游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因素便大量出现在薛家岗文化分布区域内,它们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具有较大优势,而本土的薛家岗文化则未能得到很好的传承,类似的现象同样也表现在环巢湖流域甚至是长江中下游更广大区域。因而,大汶口文化南下皖西南很可能是张四墩类型诞生的一个关键因素或者是直接动因。当然,在张四墩类型的形成过程中,史家河文化也曾给予了较多的影响,良渚文化也有过部分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在张四墩类型的文化因素组成中不是决定性的,所以说,张四墩类型应该是薛家岗文化晚期在受到淮河中游大汶口文化的较大冲击后,出现了衰落和变异,其后受西部史家河文化的较大影响和东部良渚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这种方式与薛家岗文化的产生有着十分相似的一面,换言之,张四墩类型的产生是与当时整个淮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之间的大规模文化交流或冲突的背景有关,与薛家岗文化一样,它也有多元化的特点。

四.文化变迁的过程

皖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经历了黄鳝嘴类型——薛家岗文化——张四墩类型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在黄鳝嘴类型时期,遗址的数量还很少,目前只

发现了4处,主要沿长江北岸零散分布,文化面貌与西边的大溪文化有较多的关联,而与东边的北阴阳营、崧泽文化也有着一定的联系,但这些联系主要表现为一种更偏向于西边、以吸收、融合、变异为主的状态。黄鳍嘴类型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演化为薛家岗文化,遗址的数量大大增加,分布密度较大,分布范围也扩展到整个皖河流域、大沙河流域甚至大别山腹地,但在演化过程中向东边吸收了较多的崧泽文化因素和少量的北阴阳营文化因素,北方的大汶口文化也有少量的联系,而西边的文化影响明显很少,体现的是一种以本土因素为主,较多地融合东边的文化因素,并兼受西、北两个方向的文化的影响。但这种状况在薛家岗文化发展成熟后出现了变化,他文化因素的影响减少,一些自身的文化因素开始向外传播。到了薛家岗文化的晚期偏晚阶段,东边的良渚文化因素开始向该区域较多地渗透;而更为重要的是,北方的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也逐渐增强,这种影响(或者说是冲击)到了薛家岗文化最晚期显得十分明显,正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薛家岗文化没有在本土得到很好的传承,而是出现了衰落和变异,蜕变为张四墩类型。张四墩类型的遗址数量较薛家岗文化相比又有一定的增加,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张四墩类型形成过程中,西边的石家河文化对其有较大的影响,东边的良渚文化也有着若干影响,这时的皖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再次经历了北、西、东三个方向的文化影响。

因此,皖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变迁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文化来源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多元化特点。二是文化交流的方向具有多变性。在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东、西、北三个方向的同时期文化的影响程度不稳定,在文化发达时期则自身的文化因素又对外有广泛的影响。多元化和多变性这两“多”的特点,一方面体现了该区域内新石器时代文化变化快、适应快,同时也说明了处在环太湖、环洞庭湖和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地区三大文化圈之间的亚文化系统对强势文化无法摆脱的被动状态。这样一种状态的出现应当是与当时整个长江中下游文化交流的大背景有关的。

总之,皖西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其产生、发展和变异的过程中,一直与周边地区的其他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对东部地区始终是以吸收为主而传播为次,对西部地区是吸收与传播并重,对南部地区则主要是以传播为主而吸收为次,对北部地区以吸收为主,但不具有

持续性而是具有阶段性。

注释:

①朔知:《皖江区域考古的意义》,《文物研究》总第十四期,黄山书社,2005年。

②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宿松黄鳍嘴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

③高一龙:《太湖县王家墩遗址试掘》,《文物研究》总第一期,1985年。

④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枞阳、庐江古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阚绪杭、方国祥:《枞阳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调查报告》,《文物研究》总第八期,黄山书社,1993年。

⑤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庆市博物馆:《安徽安庆市皖河流域先秦遗址调查报告》,《文物研究》总第十四期,黄山书社,2005年。

⑥可参看屈家岭遗址考古队:《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⑦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57、60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

⑧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125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⑨关于薛家岗文化分布及其内涵的详细介绍,参见《潜山薛家岗》第五章第三节,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⑩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潜山县天宁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7年第11期。

⑫许闻:《怀宁黄龙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研究》总第二期,1986年。

⑬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望江汪洋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⑭阚绪杭:《望江县赛口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麻圆墩遗址的试掘》,《文物研究》总第十一期,黄山书社,1998年。

⑮张敬国等:《望江黄家堰遗址发掘成果丰硕》,《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24日第一版。

⑯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太湖、宿松古文化遗址调查》,《安徽文博》总第3期,1983年。

⑰高一龙:《太湖县王家墩遗址试掘》,《文物研究》总第一期,1985年。

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枞阳、庐江古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

⑲杨德标、阚绪杭:《岳西县祠堂岗、鼓墩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文物出版社,1986年。

(下转第30页)

1.82、外径 1.23~1.28 厘米(图十九, 19)。半球形隧孔珠, 标本 M18: 1, 浅墨绿色, 隧孔面相对平整, 正面弧凸, 未抛光, 留有明显的倒棱痕迹, 隧孔以两侧斜向的先后榫钻而成。高 0.64、外径 0.95~1.07 厘米(图十九, 20)。

镯 仅发现一件。标本 M56: 6, 黄褐色, 镯体截面呈椭圆形。高 1.6~1.85 厘米。双向管钻孔, 孔内壁经过修磨, 内径 5.15~5.2 厘米。镯外径 7.1~7.2 厘米。

五. 小结: 苕溪流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

本次发掘的墓葬及随葬品特点鲜明, 组合明确, 如出石钺者均有玉器, 且与石镞、石镞配伍, 而不与纺轮配伍, 性别特征明显。东区中组墓葬中东西成排的 M37~M50 均为男性墓, 这些特点与庙前遗址第一、二次发掘及瑶山墓地结构类似。出土如此多数量的石犁尚属首次, 为进一步研究其功能提供了科学的丰富资料。根据其它遗址的遗物等类型学比较, 其相对年代约当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晚期阶段或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阶段, 并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湖州地区地理位置独特, 西依天目山与安徽

接壤, 北有苏南宜溧山地略阻断, 东面向广袤的杭嘉湖平原, 东北临太湖, 地理环境上既属于长江下游地区、太湖流域、杭嘉湖平原, 更是东西苕溪流入太湖的交汇点。在苕溪流域中目前已发现的相关遗址如余杭良渚遗址群、湖州的邱城、湖州千金塔地、长兴雉城台基山遗址、长兴林城蒋家山遗址、安吉递铺安乐和芝里遗址等(图一), 尤其是良渚遗址群的庙前遗址的第一、二次发掘的早期墓地中, 墓葬的排列及随葬器物中的盘类与本次发掘多有相似之处, 其实早在马家浜文化阶段, 这一流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就显示了与地理位置和环境有关的独特的文化面貌, 随着现在和今后对这一地区更加深入的工作开展, 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地位会更清晰, 也可作为揭示作为良渚文化中心遗址的良渚遗址群在这一地区崛起的背景或原因以及发展过程等问题提供科学的资料。

考古队成员: 方向明(领队)、闵泉、陈兴吾、葛建良、费胜成、齐宏均、刘福刚、邓喜怀、何国俊

绘图: 方向明

执笔: 方向明、闵泉、陈兴吾、费胜成

(上接第 64 页)

②④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安庆市夫子城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2 年第 2 期。

②⑤详细论述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潜山薛家岗》第五章第三节之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部分。

②⑥湖北省黄冈地区博物馆:《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墓葬》,《考古学报》1987 年第 3 期;黄冈地区博物馆:《1990 年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墓葬清理发掘》,《鄂东考古发现与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年。

②⑦杨美莉:《彩石、玉刀的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五卷第三期,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1998 年。

②⑧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太湖、宿松古文化遗址调查》,《安徽文博》总第三期,1983 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枞阳、庐江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7 年第 4 期;阚绪杭、方国祥:《枞阳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调查报告》,《文物研究》总第八期,黄山书社,1993 年。

②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安庆市张四墩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4 年第 1 期。

②⑩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004 年。

②⑪杨德标、阚绪杭:《岳西县祠堂岗、鼓墩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文物出版社,1986 年。

②⑫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湖北麻城栗山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0 年第 4 期。

②⑬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

②⑭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湖北麻城栗山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0 年第 4 期。

②⑮嘉兴博物馆等:《浙江嘉兴雀幕桥发现一批黑陶》,《考古》1974 年第 4 期。



本期“史前文化”专栏,选登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先生的《反山 M12 再思-- 良渚遗址群显

贵者墓葬个案的研究》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朔知先生的《皖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变迁》。

良渚遗址群以及位于遗址群中部的反山墓地对于良渚文化、长江下游地区史前历史乃至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的重要性无需多言。能够碰到并发掘出这样一个墓地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反山 M12 再思-- 良渚遗址群显贵者墓葬个案的研究》一文作者方向明先生虽不是反山墓地的发掘者,却是墓地的整理者和新出版的《反山》报告编写者。同时也是很多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者以及《崧山》等重要报告的编写者,对于反山墓地乃至良渚文化的墓葬制度有很透彻的了解并发表过很多相关论文。而本文对出“琮王”的反山 M12 的个案研究,特别关注的是墓葬中随葬器物放置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及其与已经朽坏有机物质之间的联系,试图复原这些器物原初的存在状态,因而对于了解反山墓地以及良渚文化的埋葬制度、礼仪文化和社会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反山墓葬保存状况十分不理想,一些有机物甚至是人骨、象牙器具等都已朽烂殆尽,发掘的时候由于是第一次遇到良渚文化这样大型的墓葬,基本没有先例可以参考,因此尽管发掘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很难将随葬品最原初的状态完全恢复出来,因此就特别需要本文这样参照其他相关材料对原始资料的‘再发掘’。

皖西南地区是东西连接长江中下游、南北交通淮河和赣鄱地区的所谓‘四战之地’,在文化地理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个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开始的时间虽晚,但在近年来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皖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变迁》一文作者朔知先生参加过本地区很多遗址特别是薛家岗遗址的发掘,并主持编写出版了《潜山薛家岗》报告,同时还对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过详细的调查,因此十分熟悉相关的材料。文章详细阐述了本地区新石器时代从黄鳝嘴类型经薛家岗文化到张四墩类型的文化发展过程,分析了不同时期本地文化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往来情况,从而在广阔的视角下论述了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同是也加深了我们对于周围长江中下游以及黄淮地区、赣北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对于关心本地区史前文化的读者来说是很值得一读的。

栏目主持人介绍

张 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1964 年生于北京,1997 年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表论著有《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 年)等。